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何以培育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韩颖, 李宝刚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价值凝练, 更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培育企业家精神已成为新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交叠双重差分法探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家精神培育具有促进作用, 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两个层面助力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其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促使企业增强内治, 降低外部竞争成本; 其二,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 强化企业的法治遵循。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影响更为明显, 且在信用环境欠佳地区以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 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来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社会信用环境; 企业家精神; 信息透明度;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法治遵循

中图分类号: F123.93; F27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26) 01-0050-13

一、问题提出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1], 企业家的大批出现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挥其社会作用所必备的独特标识, 是其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和素质能力的集中体现。与旧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相比,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主体发挥独特作用的核心, 其内涵不仅包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等传统特质, 还融入了更高的道德追求和社会价值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弘扬企业家精神,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表明,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更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的重要动力。然而,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 企业作为资本的代言人, 受逐利本性驱动, 往往难以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置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之上^[2]; 另一方面,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在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阶段具有一定差异, 这既增加了理论研究的难度, 也为制定长期、稳定的培育政策带来了困难。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针对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这一问题, 已有研究大多指向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3]。营商环境对企业而

言是至关重要的^[4]。同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具有深远意义。中国自2003年起即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建立健全诚信褒奖和失信惩戒机制，持续探索信用体系建设路径。为进一步优化信用环境、夯实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构建企业层面的失信惩戒机制，这标志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为加快政策落地，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确定首批11个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6年4月，32个城市（区）被纳入试点范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见表1）。尽管各地推进重点不尽相同，但总体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完善地方信用信息平台，便于公众查询和使用信用信息。二是构建跨部门联合奖惩机制，强化信用审查与监管。三是依托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建设数据共享平台并融入地方特色。例如，苏州市打造的“信用苏州”平台，不仅公示守信与失信企业名单，还推出“桂花分”评价体系，为信用优良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体现出信用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实际引导作用，也反映出示范城市在信用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表1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实施过程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内容
2014年6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明确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顶层设计
2015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沈阳等11个城市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复函》（发改财金〔2015〕1667号）	同意沈阳市、青岛市、南京市、杭州市、义乌市、温州市、无锡市、宿迁市、合肥市、芜湖市、成都市为第一批试点城市
2016年4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北京市海淀区等32个城市（城区）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城区）工作方案的复函》（发改财金〔2016〕769号）	同意北京市海淀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海市，辽宁省大连市、鞍山市、辽阳市，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上海市浦东新区、嘉定区，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安庆市、淮北市，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山东省潍坊市、威海市、德州市、荣成市，河南省郑州市、南阳市，湖北省武汉市、咸宁市、宜昌市、黄石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惠州市，四川省泸州市为第二批试点城市
2016年6月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全面实施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的核心机制与运行框架
2017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指标（2017年版）〉的通知》（发改财金〔2017〕1087号）	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创建、评估与验收工作，提供了一套全面、统一、量化的评审标准与考核体系
2017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规〔2017〕1798号）	为联合奖惩机制提供具体的操作规范，重点对“红名单”（守信）和“黑名单”（失信）的认定标准、发布程序、管理应用及权益保护等进行统一规定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优化信用环境和制度约束，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好的信用环境会促进企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市场领域并通过生产性活动创造社会财富，而非在虚拟经济、寻租以及货币投机中谋取利益^[5]。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该影响是否存在情境依赖性？系统解答上述问题，不仅能实证检验社会信用体系的微观治理效能，而且能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以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

关键的理论依据与精准的政策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利用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指标,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后果聚焦于企业家精神,扩展了相关政策评估的研究边界。现有文献多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创新^[6]、融资约束^[7]、违规行为^[8]等单一维度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企业家精神这一更为综合的企业特征,丰富了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微观效应的研究。第二,在影响机制上,系统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双重路径机制。本文分别从资源配置优化视角和信息环境改善视角出发,验证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作用机制,这为打开社会信用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黑箱”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在因果关系的识别层面,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评估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效应。这可以有效缓解现有文献在研究信用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关系时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和混淆因果风险,为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因果证据。

二、文献综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以增进企业间的理解与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规范,信任历来受到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信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宏观层面,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促进互信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例如改善地区经济绩效^[9]与资本积累效率^[10];在微观层面,信用环境改善可抑制企业违规行为^[8],并且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11]、抑制环保失信^[12]、缓解融资约束^[7],展现出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企业家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家将资源投入生产的过程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13]。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核心素质的凝练,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关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定义,可从三个层面理解^[14]:一是个体层面,精神载体为创业者,体现为创新与初次创业;二是组织层面,载体为企业本身,表现为持续的内部革新;三是社会层面,载体为社会组织,反映为社会的结构性变革。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其中组织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最能兼顾企业个体特征与时代变迁,同时企业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基于此,本文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界定于企业组织层面,将法人实体视为企业家的代表。这一界定有助于提炼不同企业间的共性,归纳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原则。在此框架下,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在面对复杂社会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内核。

关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普遍肯定其积极影响。在宏观层面,李宏彬等发现企业家精神每提升1%,可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3%^[15];张远记和王飞鹏基于2010—2022年山东各地级市面板数据,验证了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16]。微观层面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良好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二元创新的推动效果^[17],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18]。在影响因素方面,丁栋虹归纳出综合效应、文化、创新、社会公共关系与社会服务五类因素,并强调综合效应的核心地位^[19]。实证研究也发现,城市品牌如文明城市评选等可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20]。本文在此基础上,从信用环境改善的角度展开了更系统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但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间:

第一,在测量方法上,既有研究多从创新这一单一维度测度企业家精神^[20-21],虽便于操作,却过度简化其丰富内涵。本文采用的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指标基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与国际视野五个维度构建,结合文本分析与大语言模型赋权,能够更系统、全面地捕捉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内涵。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多聚焦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某一具体企业行为的影响^[8],缺乏对其综合影响的整体刻画。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助于

全面评估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第三，在机制探索上，现有研究对信用环境改善如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路径分析不足。本文将从资源配置优化与信息环境改善双重视角，系统解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为揭开该“黑箱”提供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直接影响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促进相互信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优化整体营商环境；从微观层面看，信用环境的改善也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另一方面，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凝练，其培育不仅需要企业家个体的主观努力，更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信用生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制度框架，能够引导企业将资源投向生产性活动，强化诚信守法意识。这些都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所倡导的创新、诚信、社会责任等核心要素高度契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积极作用。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的间接影响

首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引导企业将发展重心从外部寻租转向内部治理，从而为培育企业家精神奠定基础。企业寻租行为是为了逃避管制或获取倾斜资源^[22]，其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过度依赖寻租会抑制创新投入，导致寻租收益对创新动力产生挤出效应^[23]，削弱企业通过技术与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社会信用体系借助数字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增大了企业寻租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它能够整合政务与商业数据，提升企业从公共平台获取信息的便利性，缓解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24]，推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这使得企业更有必要通过创新赢得市场，减少对外部寻租的依赖，进而将更多资源配置于内部发展，提升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25]。由此，企业创新激励与回报得以增强，创新意愿得到提振，从而有力培育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鼓励企业从公共平台获取信息，减少企业外部寻租行为，从而促进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体现为内治促进效应。

其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强化信息透明度与法治遵循，进一步激发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信用体系建设将信用从道德约束上升为制度规范^[22]，促使企业重视自身信用，主动提高信息透明度。信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26]，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摩擦，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在透明度要求较高的信用环境下，企业为维持可持续经营与长期盈利，会主动减少违规行为，注重对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遵守。根据马奎斯和钱（Marquis & Qian）的分析，信息不对称不利于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27]。因此，社会信用环境所推动的信息透明与法治遵循，能够降低企业运营的合规风险，增强内外部信任，为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进而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产生激励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升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倒逼企业减少违规行为，增强法治遵循意识，进而促进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体现为合规引导效应。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企业层面的数据，包括企业家精神相关测度指标及其他财务与治理变量，均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本文将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的企业定义为处理组，将始终位于非试点城市的企业定义为控制组（具体城市名单见表 1）。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常规处理：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以及被标记为 ST、*ST 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一个非平衡面板

数据集。其中, 处理组企业共计 13 853 个观测值, 控制组企业共计 14 943 个观测值, 两组样本数量基本平衡, 满足进行双重差分比较分析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样本, 本文构建如式 (1) 所示的交叠双重差分模型, 通过比较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后企业家精神的变化, 以期识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因果效应:

$$Entre_{i,n,c,t} = \alpha + \beta Did_{c,t} + X'_{i,t} \delta + \mu_i + \gamma_n + \omega_c + \tau_t + \varepsilon_{i,n,c,t} \quad (1)$$

其中, $Entre_{i,n,c,t}$ 表示 c 城市 n 行业的 i 企业在 t 时期的变化; $Did_{c,t}$ 表示企业所在的 c 城市 t 时期是否被确立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 若企业所在的城市在 t 时期及以后被确立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取值为 1, 否则为 0; $X'_{i,t}$ 代表控制变量向量, μ_i 、 γ_n 、 ω_c 和 τ_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n,c,t}$ 为随机扰动项。为了缓解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带来的问题, 本文使用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Entre$)。本文使用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指标^[28]作为测量变量。该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其中一级指标的五个方面来自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 二级指标则是对一级指标的具体阐释, 具体如表 2 所示。为了科学确定其权重, 首先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及系列重要讲话进行词频统计分析, 形成初始权重框架, 并向学界专家和业界人士发放问卷, 广泛征集对各指标重要性的判断, 并通过文本分析、大语言模型等方法对权重分配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在测度方面, 对各评估内容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效用值, 通过加权平均得到二级指标得分, 最终根据既定权重计算一级指标得分和企业家精神综合评价得分。

表 2 企业家精神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爱国情怀	纳税情况	税收绝对值	10.00
	共同富裕	劳动收入份额占比	10.00
勇于创新	创新潜力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	5.00
	创新投入	创新经费投入	10.00
		创新人力资源投入	10.00
	创新绩效	人均专利产出	10.00
诚信守法	诚信	信息披露失真	5.00
	法治	违法情况	5.00
社会责任	社会捐赠	贡献价值	10.00
	稳定就业	企业新增人员数	10.00
国际视野	国际化深度	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	7.50
	国际化广度	海外子公司分布地区数量	7.50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设置 Did 作为政策冲击变量, 以政策实施的城市与年份构建虚拟变量 $treat \times time$ 。如果某企业所在的城市在某年份及以后被确立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 Did 的取值为 1, 否则为 0。具体城市如表 1 所示。

3. 控制变量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偏误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黄卓等^[8]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lnSize*，使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企业负债率（*Lev*，使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表示）、净资产收益率（*ROE*，使用净利润与净资产之比表示）、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现金流比率（*CashFlow*，使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之比表示）、董事会规模（*lnBoard*，使用董事会人数的对数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使用机构持股总数与公司总股本之比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是否经由四大审计（*Big4*）作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EPS数据库，本文同时对连续变量进行逐年上下1%的缩尾处理，并参照通行做法剔除了不良观测值（如金融企业、退市企业等样本）。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企业家精神（*Entre*）的最小值为11.0153，均值为43.4195，最大值为69.8408，说明各企业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i>Entre</i>	28 796	43.419 5	6.126 5	11.015 3	69.840 8
解释变量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i>Did</i>	28 796	0.336 9	0.472 7	0	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i>Size</i>	28 796	93.615 3	225.760 0	2.877 9	3 076.670 0
	企业负债率	<i>Lev</i>	28 796	0.411 5	0.198 2	0.027 8	0.934 3
	净资产收益率	<i>ROE</i>	28 796	0.050 4	0.135 8	-0.700 5	0.417 9
	营业收入增长率	<i>Growth</i>	28 796	0.310 7	0.921 8	-0.925 8	17.107 3
	现金流比率	<i>CashFlow</i>	28 796	0.048 4	0.067 2	-0.226 2	0.265 6
	董事会规模	<i>Board</i>	28 796	8.443 9	1.604 0	5	15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Inst</i>	28 796	0.420 7	0.240 9	0.001 0	0.923 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28 796	0.333 1	0.144 5	0.076 0	0.757 9
	是否经由四大审计	<i>Big4</i>	28 796	0.036 6	0.187 9	0	1

注：*Size* 的单位为亿元。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识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本文对式（1）进行了递归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1）汇报了加入企业和年份层面固定效应的结果，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和列（3）分别加入了两位数代码的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为了更好地说明经济意义，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形成一个半弹性模型。列（4）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使企业家精神提升了0.92%，这一结果证实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带来的信用环境的改善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即假设1成立。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Did</i>	0.623 9 *** (0.167 0)	0.588 5 *** (0.154 5)	0.463 9 *** (0.163 2)	0.009 2 ** (0.004 3)

表4(续)

变量	(1)	(2)	(3)	(4)
<i>lnSize</i>	2.035 7 *** (0.093 6)	2.081 0 *** (0.097 8)	2.022 9 *** (0.094 0)	0.046 3 *** (0.002 5)
<i>Lev</i>	-1.160 3 ** (0.465 6)	-1.133 4 *** (0.457 8)	-1.028 5 ** (0.467 0)	-0.025 8 ** (0.011 8)
<i>ROE</i>	1.754 3 *** (0.336 1)	1.758 7 *** (0.336 8)	1.702 5 *** (0.332 8)	0.048 9 *** (0.009 0)
<i>Growth</i>	0.067 0 * (0.037 2)	0.070 3 * (0.037 7)	0.082 6 ** (0.038 1)	0.001 6 (0.001 1)
<i>CashFlow</i>	0.147 1 (0.569 8)	0.155 5 (0.540 5)	0.227 0 (0.543 4)	0.003 4 (0.014 1)
<i>lnBoard</i>	0.050 9 (0.271 4)	-0.026 6 (0.274 1)	0.044 7 (0.277 5)	0.001 3 (0.007 1)
<i>Inst</i>	1.278 7 *** (0.422 6)	1.404 6 *** (0.401 4)	1.447 6 *** (0.404 7)	0.036 3 *** (0.010 1)
<i>Top1</i>	-0.932 1 (0.680 3)	-0.658 6 (0.627 4)	-0.649 9 (0.631 3)	-0.015 9 (0.015 8)
<i>Big4</i>	-0.013 8 (0.382 3)	-0.100 8 (0.383 8)	-0.130 0 (0.389 2)	-0.002 6 (0.009 4)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765 4 (2.161 1)	-2.743 6 (2.257 2)	-1.635 3 (2.150 9)	2.728 5 *** (0.056 9)
$\overline{R^2}$	0.691 8	0.695 5	0.696 1	0.707 4
样本量	28 796	28 796	28 796	28 796

注: 列(4)的被解释变量经过对数化处理。***、**、*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评估。采用动态效应检验来对平行趋势进行评估, 并纳入 $\sigma_{p,t}$ 用以控制随省份、年份变化的政策变化^①。在政策实施之前, 回归系数 β 的置信区间包含零值, 而在政策实施之后, 回归系数 β 显著异于零^②。此外, 本文还采用兰巴昌和罗思 (Rambachan & Roth)^[29] 的方法进行平行趋势的敏感性检验。(2) 安慰剂检验。本文进行 500 次随机重复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基准回归系数处于随机分布尾部。(3) 确保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更加可比。本文引入基期试点选择变量并分

① 例如, 2018 年, 四川、河南等省份纷纷出台具体的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的实施意见。

② 本文还检验了所有事前系数联合为 0 的 F 检验, F 统计量为 0.80, 无法拒绝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假设, 进一步提供了关于不存在事前差异的证据。

别与时间趋势交互,同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法与合成双重差分法重新估计基准回归模型。(4)异质性处理效应。使用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分解来检查负权重的占比,结果表明“后处理与先处理”这类导致主要估计问题的权重仅为0.021,并使用德谢兹马丹和德奥尔特弗(de Chaisemartin & D'Haultfoeuille)^[30]的twowayfeweights命令对负权重进行再检验。此外,本文纳入了插补估计量、堆叠估计量以及局部投影估计量。(5)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考虑了双重机器学习、调整聚类稳健标准误(企业-年份双重聚类),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中纳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并控制了智慧城市、国家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等多项政策虚拟变量)^①。上述系列检验结果均支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打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之间的黑箱,依据前文理论,本文参照江艇^[31]的研究,设定式(2)进行机制检验:

$$Mechanism_{i,n,c,t} = \alpha + \beta Did_{c,t} + X'_{i,t} \delta + \mu_i + \gamma_n + \omega_c + \tau_t + \varepsilon_{i,n,c,t} \quad (2)$$

其中, *Mechanism* 是本文所需检验的机制变量。

为探究信用体系是否促使企业增强内治,本文首先使用超额管理费用(*EMF*)作为企业寻租的代理变量估计式(2)。表5列(1)结果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降低管理费用率,从而抑制企业寻租行为。其次,使用LP法和FE法分别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重新估计式(2)。如表5列(2)和列(3)所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创新绩效总量(*TI*)来衡量创新的数量,并将企业的创新绩效分为突破性创新(*BI*)和渐进性创新(*II*),用以衡量企业的创新质量。其中,创新绩效总量使用企业当年独立获得的专利数量取对数进行衡量。如表5列(4)所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突破性创新反映了企业突破式的创新行为,表现为企业突破了关键性技术^②。表5列(5)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突破性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促进企业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从无到有的技术突破,从而带来更高的技术溢出,促进新型技术的研发。渐进性创新指的是企业对现有产品技术的整合利用,本文使用当年独立获得的实用新型数量与外观设计数量之和取对数来衡量。如表5列(6)所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增加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专利水平和质量,尤其是实现了企业的核心技术突破,而并非原本技术的整合。

表5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寻租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0.011 7*** (0.002 2)	0.074 7** (0.024 7)	0.093 3*** (0.028 3)	0.099 8** (0.042 7)	0.079 8** (0.031 1)	0.056 1 (0.039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53 4*** (0.042 8)	-4.674 1*** (0.367 1)	-7.950 1*** (0.327 1)	-0.172 3 (0.610 2)	-1.688 1*** (0.433 2)	-0.464 9 (0.583 1)
$\overline{R^2}$	0.621 6	0.663 1	0.818 2	0.738 8	0.680 1	0.721 2
样本量	28 792	28 436	28 436	28 796	28 796	28 796

注:列(1)—列(6)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EMF*、*TFP_LP*、*TFP_FE*、*TI*、*BI*和*II*;固定效应包括企业、年份、行业和城市,后表同。

① 限于篇幅,省略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备索。

② 具体计算公式为:当年独立获得的发明数量×0.5+当年独立获得的实用新型数量×0.3+当年独立获得的外观设计数量×0.2。

综上所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其信息披露与失信惩戒功能, 提高了企业寻租的机会成本, 从而有效抑制了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 同时, 被抑制的资源随后被重新配置到生产性领域, 这直接体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创新活动, 特别是突破性创新质量明显提高。因此, 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抑制寻租行为、引导资源内治, 能够促进培育企业家精神, 即存在内治促进效应。由此, 假设 2 得到验证。

信息透明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分析师预测盈余准确性反映了分析师的信息收集行为和企业的披露质量, 而分析师盈余预测越准确, 信息透明度可能越高。根据这一逻辑, 本文使用分析师预测分歧度 (*AFD*) 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信息透明度, 同时使用辛清泉等^[32] 的研究构建会计信息透明度指数 (*IT*) 来估计式 (2)。具体而言, 表 6 列 (1)、列 (2) 结果表明, 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 进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地, 本文使用企业违规次数 (*CV*) 和高管违规次数 (*EV*) 作为企业法治遵循的代理变量, 表 6 列 (3)、列 (4) 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减少了企业与高管的违规行为。

表 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信息透明度、企业违规与高管违规

变量	(1)	(2)	(3)	(4)
<i>Did</i>	-0.001 1*** (0.000 1)	0.009 1* (0.005 0)	-0.095 1*** (0.029 1)	-0.145 5*** (0.029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08 2 (0.007 2)	-0.812 3*** (0.069 2)	-2.244 3*** (0.445 0)	1.915 4*** (0.542 1)
$\overline{R^2}$	0.269 4	0.638 5	0.279 5	0.102 4
样本量	15 516	23 289	26 343	25 489

注: 列 (1)—列 (4) 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AFD*、*IT*、*CV*、*EV*。

综上所述, 表 6 的实证结果共同验证了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强化法治遵循来培育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这表明, 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够从信息约束与法律威慑两个维度, 有效引导企业行为回归合规诚信的轨道, 即存在合规引导效应。由此, 假设 3 得到验证。

(四) 交互效应分析

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竞争当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衷就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由此可知,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为验证这一推断, 本文使用第一类代理成本来衡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分别用 *AC1* 与 *AC2* 表示^①, 并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一类代理成本变量, 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变量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变量的交互项。从表 7 可以看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信用环境的改善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就越强。

表 7 交互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Did</i>	0.227 3 (0.152 3)	0.392 4** (0.145 2)

① 分别为企业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除以企业营业收入, 以及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表7(续)

变量	(1)	(2)
AC1	-1.403 3 ** (0.598 0)	
Did×AC1	1.162 1 *** (0.314 0)	
AC2		-1.983 6 *** (0.727 7)
Did×AC2		0.802 1 * (0.435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80 0 (2.0109)	-2.616 0 (2.048 1)
$\overline{R^2}$	0.697 4	0.696 2
样本量	28 596	28 796

（五）异质性分析

在企业层面，本文从治理水平和产权性质两个维度展开讨论。首先，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社会信用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更友好的信用环境，因而能够更有效地将信用体系建设带来的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家精神的提升。借鉴林树和葛逸云^[33]的研究方法，采用经主成分分析处理后的公司治理指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治理水平组并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8 所示，治理基础较好的企业更能适应透明度提升与法治遵循的要求，并在外部交易成本降低后，将更多资源配置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其次，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家精神培养的正向影响可能有所差异。本文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响应能力。这源于其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在政策信息获取和制度资源对接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得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针对地区层面的异质性，本文从城市营商环境与区域差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基于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信用环境组进行分组回归。表 8 结果显示，信用基础薄弱的地区原本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与市场无序问题，信用制度引入带来的边际改善效应更大。其次，按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回归。表 8 结果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促进效应更强，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该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中部和西部地区原有信用制度相对滞后，企业在无序竞争中资源消耗较大，信用体系通过完善制度供给、提升市场透明度，发挥了“补短板”的作用。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治理水平		产权性质		信用环境		区域		
	高	低	国有	非国有	高	低	东部	中部	西部
Did	0.606 1 *** (0.205 1)	0.273 3 (0.305 5)	0.701 5 *** (0.236 5)	0.259 8 (0.220 2)	0.279 3 (0.219 0)	0.629 1 ** (0.299 1)	0.369 1 * (0.193 8)	0.816 8 ** (0.328 6)	1.277 8 *** (0.276 5)

表8(续)

变量	治理水平		产权性质		信用环境		区域		
	高	低	国有	非国有	高	低	东部	中部	西部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61 4 (2.952 8)	-4.014 4 (4.326 2)	-1.634 5 (4.400 5)	0.046 9 (3.137 9)	4.425 2* (2.558 7)	-15.571 6*** (4.239 0)	1.179 4 (2.397 4)	-7.928 5 (5.387 9)	-5.580 4 (5.588 7)
$\overline{R^2}$	0.717 9	0.698 5	0.728 6	0.665 1	0.713 2	0.665 0	0.685 8	0.702 8	0.674 3
样本量	15 314	13 482	9 645	19 151	17 814	10 527	19 792	4 863	4 141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呈现不同特点:企业层面在治理水平高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地区层面则更突出于信用基础薄弱地区和中部及西部地区。这种差异源于作用机制的不同:在企业层面,信用体系的效果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组织与资源能力;而在地区层面,其作用更多取决于原有的信用基础,基础越薄弱,制度改善的边际收益越大。这说明制度效应在微观上受主体能力制约,在宏观上则受制度初始条件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民营经济中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背景,利用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第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降低企业外部寻租动机,推动资源向内治倾斜;二是提升信息透明度与法治遵循意识,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从而激励企业家精神。第三,在微观层面,政策效果在国有企业与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宏观层面,中部、西部及信用基础薄弱地区的企业受益更大,反映出制度建设的普惠性与边际递减特征。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 第一,加快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信息共享。政府应借鉴试点经验,全面推进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立信用承诺制度与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并培育市场化征信与信用服务机构。企业应主动运用信用评级与记录优化合作与资源配置决策;金融机构应将企业信用作为授信关键依据,对信用良好者提供更优惠融资条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第二,依托信用体系的双重机制,多渠道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一方面应借助信用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与外部竞争成本,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应主动提升信息透明度,依法依规披露信息,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增强市场信任与法治意识。政府应鼓励企业提高财务透明度,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为创业质量提升提供支撑。
- 第三,实施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推进信用体系建设。针对企业差异,应加强对治理基础较弱的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信用管理培训与咨询,帮助其提升信用能力;在融资与评级政策中应关注信用改善趋势,给予持续改善者更多倾斜,避免制度红利集中于少数企业。在地区层面,中西部及信用薄弱地区应加快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降低企业信息成本,并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改善营商环境;东部地区则应推进信用体系精细化与多场景应用。此外,应推动信用领域综合性立法,完善信用承诺、评价、分级监管与修复等制度,持续发挥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 [1] 张维迎, 盛斌. 论企业家: 经济增长的国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2] TERJESEN S, HESSELS J, LI D.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1): 299-344.
- [3] 吴晶妹, 崔智斌, 陈静远.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10): 36-55.
- [4] 吴心涓, 范黎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效应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27(5): 3-19.
- [5] 魏下海, 董志强, 张永璟. 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 ——来自民营企业“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 2015(2): 105-116.
- [6] 赵晓坤. 社会信用环境与区域创新发展关系研究——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2(6): 161-164.
- [7] 陶云清, 张金林. 社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3, 30(2): 89-105.
- [8] 黄卓, 陶云清, 王帅.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 ——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23(5): 96-114.
- [9]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 [10] 计小青, 乔越, 赵景艳. 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信任和资本积累效率[J]. *财贸经济*, 2020, 41(11): 83-96.
- [11] 邱保印, 余梦, 左静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3, 25(5): 92-106.
- [12] 左静静, 邱保印, 蒋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抑制企业环保失信?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3, 45(3): 101-117.
- [13] REYNOLDS P D, HAY M, CAMP S 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1999 executive report[R]. Kansas City, MO: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1999.
- [14] 时鹏程, 许磊. 论企业家精神的三个层次及其启示[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2): 44-51.
- [15]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等.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9, 44(10): 99-108.
- [16] 张远记, 王飞鹏. 企业家精神、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老字号的新证据[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24, 22(4): 74-87.
- [17] 朱兆珍, 周雪梅, 王清.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二元创新[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5): 43-55.
- [18] 金环, 蒋鹏程. 企业家精神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基于数字专利视角[J]. *经济管理*, 2024, 46(3): 22-39.
- [19] 丁栋虹. 企业家精神: 全球价值的道商解析[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 [20] 崔登峰, 王楠楠, 王海忠. 城市品牌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经验证据[J]. *营销科学学报*, 2024, 4(2): 80-99.
- [21] 曹希广, 邓敏. 电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J]. *世界经济*, 2024, 47(4): 31-64.
- [22] 李雪灵, 张惺, 刘钊, 等. 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11): 84-96.
- [23] 陈经伟, 姜能鹏.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机制、异质性与持续性[J]. *经济动态*, 2020(12): 106-124.
- [24] 范润, 孙雪娇. 社会信用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3, 44(3): 64-72.
- [25] 张超林. 寻租、资源错配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 2025, 39(3): 90-97.
- [26] 曹雨阳, 孔东民, 陶云清.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效果评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J]. *财经研究*, 2022, 48(2): 93-108.
- [27] MARQUIS C, QIAN C 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in China: symbol or substance?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 25(1): 127-148.
- [28] 张三保.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精神数据库[Z].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2024.
- [29] RAMBACHAN A, ROTH J. A more credible approach to parallel trend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5): 2555-2591.
- [30] DE CHAISEMARTIN C, D'HAULTFCEUILLE X.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9): 2964-2996.
- [3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32] 辛清泉, 孔东民, 郝颖. 公司透明度与股价波动性[J]. *金融研究*, 2014(10): 193-206.
- [33] 林树, 葛逸云. 经济政策关联度、公司治理与投资效率[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3): 63-76.

How Can the Credit System Cult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HAN Ying, LI Baog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serves as a critical driver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abling market entities to achieve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in a dynamic competitive landscap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encompasses not only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but also higher moral pursuits and a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reflecting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is paper treat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3 and employ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can foste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wo distinct pathways. First, by establishing cross-departmental platforms for sharing credit information, the credit system improves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increases the cost of corporate rent-seeking. This redirects corporate resources from nonproductive activitie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s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particularly i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econd, the improved credit environment raises market expectations for corpo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t reduces analyst forecast divergence and enhances the transparenc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ereby compelling enterprises to minimize violations and strengthe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enterprises with better governance structures, particular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etter positioned to leverage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o enhance entrepreneurship, indicating tha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s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accelerating improvements to the credit system,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credit information, and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it broadens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s by encompassing a comprehensive set of entrepreneuri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a single dimension. Second, it identifies two mechanisms by which credit systems curb rent-seeking, boost productivity, and enhance transpar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ird, it provides robust causal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at trea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edit system as an exogenous policy shock. Overall, th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through institutional building, underscoring the role of credit systems in aligning corporate behavior with long-term societal go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ocial credit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ule of law compliance

(编校: 李 叶; 蒋 琰)